

流动人口党员身份与社会治理参与*

吴 赢 张 翼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 流动人口是流入地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边缘化群体, 现有文献关于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动机和激励鲜有探讨。中共党员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应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维护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这是党员应履行的义务。政治身份对于个人社会事务的参与有非常强的影响, 研究党员身份对社会治理参与的影响对于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2017年广东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A卷数据, 以烙印理论为指导, 采用Probit模型, 本文研究了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 党员身份提高了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参与水平。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 该结论依然成立。对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方式的研究发现, 党员身份促进了流动人口向所在的单位和社区提建议和监督、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反映情况和提政策建议及主动参与慈善志愿活动, 但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在网络上发表关于国家和社会事件评论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 中共党员 流动人口 社会治理 烙印理论 广东省

[中图分类号] D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3)01-0081-12

一、引言

为了满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放松对人口流动的管制, 使得区域之间人口的流动得以形成^[1]。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 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是中国经济腾飞和农村地区减少贫困的重要基石。^[2-4]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3.76亿人,^① 规模巨大。然而, 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流动人口在就业、工资、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无法与当地

居民享受同等待遇^[5-6], 户籍歧视仍然存在^[7-9]。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当地^[10], 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参与。

社会治理是一个多主体的协同过程, 涉及到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不同主体。^[11-12] 由于政府作为社会服务的主要供给者, 现有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多关注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13-15]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这强调了民众在社会治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提高了学术界对民众在社会治理中所扮演角色的关注。然而, 目前关于个人在社会治理中所发挥作用的探讨较

收稿日期: 2022-03-03; 修回日期: 2022-05-06

作者简介: 吴赢,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金融学研究; 张翼, 博士, 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金融学研究。

① 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105/t20210511_1817202.html

为有限且集中在对城市居民^[16-17]和农村居民的研究^[18-19],较少文献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参与^[20]。流动人口不同于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流动性使得他们在工作地的居住具有暂时性,难以建立起较强的社会关系。^[21]同时,流动人口又属于所在社区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边缘群体。^[22]这使得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的激励具有特殊性。

个人身份特征被认为是影响个人行为 and 感知的重要因素。^[23]根据烙印理论,特定环境的学习生活经历会持续影响个人的行为决策。^[24-25]在中国,共产党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身份或社会身份。^[26]党员经过严格的选拔且受到过良好的共产主义文化教育,个人决策受到共产党员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得他们的个人行为更加符合社会群体利益,如较少的财务违规^[27]及更多的慈善捐赠^[28]。因此,党员身份可能使得流动人口克服流动性及边缘化特征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为检验上述猜想,本文采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的流动人口大省广东省2017年的流动人口调研A卷数据,研究了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参与的影响。根据调研问卷中涉及的社会治理参与包含4个问题:1)本文以流动人口是否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供建议或监督单位/社区/村务管理;2)是否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政策建议;3)是否在网上就国家事务和社会事件等发表评论/参与讨论;4)主动参与捐款、无偿献血、志愿者活动等。同时,本文构建了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参与的变量。由于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二值选择变量,本文使用Probit模型研究了流动人口党员身份与社会治理参与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1)丰富了党员身份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研究。过去的研究主要从资源的角度考虑党员身份带来的效用^[29-34],较少文献关注了党员身份具有的内在价值导向对个人行为的影响^[27-28, 35]。由于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地位边缘化特征及社会治理参与作为公利

性活动的特点,党员身份促进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参与的发现为证明党员内在价值导向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丰富了现有文献关于党员身份对个人行为影响的研究。2)扩展了个人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处课题组和李哲对全国流动人口大省广东省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全限制了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和渠道^[20]。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党员身份是影响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1. 党员身份影响的研究

共产党员身份是社会主义国家重要的政治身份,其对个人生活工作的影响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关于党员身份对个人影响的研究,党员身份带来的各种资源对个人效用的影响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例如,研究发现党员身份能够通过带来政治资源或社会资源来提高个人收入水平^[29, 33],进而提高个人和家庭成员的幸福感^[26, 31]。然而,对于具有党员身份的个人收入水平更高的事实是否由政治身份带来的资源所致仍存在争议,个人能力可能是党员获得较高收入水平的决定因素^[32, 36]。同时,党员身份带来的政治资源可以使个人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为子女获得优质的教育机会^[30]。就农村党员而言,党员身份也增加了社会网络资本,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提高了其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意愿^[37]。此外,党员身份可以帮助企业家获得更多的外部金融资源^[34],提升企业经营绩效^[38]。

部分文献从党员内在价值导向的角度探讨了党员身份对个人行为的积极影响。严格长期的党课教育和党史学习使得个人具有为他人和社会做贡献的价值导向,从而使得个人行为更符合社会健康发展的要求。如党组织的学习活动使得民营企业更多地了解国家的环保政策方

针,积极响应国家环保号召,加大对环保活动的投资^[35]。同时,党员的内在价值规范也让民营企业董事长出现较少的财务造假行为^[27]和CEO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28]。对于个人而言,为国家 and 人民利益服务的党员使命和价值观念也是个人积极主动参与志愿者活动的主要动力^[39]。

当然也有文献指出,具有党员身份的个人从事社会活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如张翠娥等^[18]采用5省的农村调研数据,研究了资本禀赋对农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发现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会更多的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活动。其背后的原因是农村党员属于农村政治精英阶层,自身的利益会更加广泛的嵌入农村诸多公共事务和社会关系中。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提高社会声望和地位的考虑,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有较大动力参与农村社会治理。^[18]

通过上述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关于党员身份对个人行为影响的研究较为欠缺且主要集中在党员身份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对于普通个人行为影响的研究较少。虽然张翠娥等人的研究与本文较为接近,但是他们关注了农村居民资源禀赋对其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发现作为特定社会资本的党员身份是影响农村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18]。本文关注的是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及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边缘化特征,使得他们与生活在乡土熟人社会的农村居民具有较大的差异。同时,流动人口参与的社会治理主要是城市社区的社会治理而非农村的社会治理,流动人口的利益与城市社区的嵌套性较小。因而,对流动人口党员身份与社会治理参与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在特殊群体背景下党员身份影响个人行为的理解。

2. 社会治理参与

社会治理指的是特定的治理主体对社会进行的管理^[2],其核心要义是公众的参与^[40],目标是民生和社会秩序^[41]。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在以政府作为主导的“一元”模式下进行。随着

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协作性要求都在提高,传统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难以对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给出有效的应对和解释方案。^[11]社会治理模式必须进行必要的调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营造见义勇为社会氛围,建设人人有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和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成为社会治理辅助力量的“一核多元”社会治理模式成为我国现代社会治理的主要逻辑^[42]。

虽然党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角色仍旧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43-44],但是其他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赵小平构建了四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分别为利益驱动的抗争型、利益驱动的合作型、价值与情感驱动的抗争型和价值与情感驱动的合作型,发现只有价值与情感的驱动的合作型会对社会治理产生积极的作用,利益驱动的合作型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是有效监督,其它两种抗争型只会对社会治理产生不利影响。^[45]对于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已经开始运用“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方式(如企业内部基层党组织、行业协会和工商联)参与市场化改革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主动参与社会治理。^[46]就个人参与社会治理而言,受教育程度、民主意识、责任意识、资本禀赋等个人特征都会影响其社会治理的参与意愿,^[18, 47-48]而参与形式则表现为居民代表大会、选举活动、社区组织和监督政府等^[17-18]。

在国家鼓励社会主体积极主动参与现代化社会治理的背景下,现有研究对非政府主体社会治理参与活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虽然部分文献研究了个人社会治理参与的影响因素及参与形式,但是这些研究关注的是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17-18, 48]。流动人口离开农村但又难以融入城市社区的尴尬境地使得对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为更好地实现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较好的政策启示,实现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

（二）研究假设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流动人口是指非户籍区居住地与户籍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籍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在我国户籍与各种社会福利资源相连接,如医疗、教育、住房等,流动人口的人户分离使得他们在现有居住地无法享受与本地户籍居民同等的待遇,面临着就业、工资、医疗等歧视,属于现有居住区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边缘群体。^[5, 22]同时,户籍制度使得他们具有较高流动性,难以在流动地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关系。^[21]而社会治理涉及到公共利益和集体目标的实现,流动人口的上述特征使得他们在社会治理提升过程中获益较小,参与社会治理的激励不足。

然而,党员身份可能促进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生物学上的烙印理论认为,在特定的环境中存在“敏感”期,焦点主体会在“敏感”期内形成适应环境的“印记”,这些“印记”具有一定的惯性,会持续影响焦点主体的行为。^[49]烙印的过程包括了三个核心的要素即敏感时期、环境印记和持续影响。^[25]其中较为关键的是环境印记。根据烙印理论文献的观点,塑造个体的环境中制度化的机构或场景是一个关键的环境,如特定的部门或组织。^[24]党员都接受过党组织较为严格选拔且经历较长期的全面入党培训,同时要定期参加党组织的学习活动,形成较深的共产主义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形成共产主义烙印^[28],影响着个人的决策行为^[27, 39]。例如《中国共产党章程》要求党员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模范先锋作用。现有研究也表明党员身份使得个人愿意保持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28],积极参与环境保护^[35]。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公共利益和集体目标的实现,是实现和谐幸福社会的主要途径。这使得受到共产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且具有党员身份的流动人口有较大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激励。其次,《中国共产党章程》要求党员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

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利益。具有党员身份的流动人口对于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诉求有较深的了解,其所受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念使得他们有较大动力参与社会治理,反映流动人口的意见和要求,如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等。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党员身份促进了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参与。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2017年的广东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A卷。该数据是国内研究流动人口问题较为常用的数据库。^[50-51]采用广东省数据是由于广东省作为全国最大的人口流动大省,流动人口总量约占全国的1/5^[20],这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同时,本文剔除相关变量缺失及变量取值为负值的样本。此外,通过对连续变量进行1%和99%分位数上的Winsorize处理来缓解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最后,本文得到8890个观测值。

（二）变量的定义

1. 流动人口的党员身份

本文采用一个虚拟变量来表示流动人口的党员身份(Party)。当一个流动人口是中共党员时,Party的取值为1;否则,Party取值为0。

2. 社会治理参与

2017的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有4个问题涉及到了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参与,分别为:1)2016年以来您是否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建议或监督单位/社区/村务管理;2)2016年以来您是否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政策建议;3)2016年以来您是否在网上就国家事务、社会事件等发表言论,参与讨论;4)2016年以来您是否主动参与捐款、无偿献血、志愿者活动等。我们定义一个虚拟变量来衡量流动人

口的社会治理参与(Govern)。当一个流动人口至少参加过上述活动中的一种时, Govern取值为1; 否则, Govern的取值为0。

(三) 研究模型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二值选择变量, 借鉴陈佳川等^[52]及冷晨昕和祝仲坤^[53]的研究, 本文采用Probit模型来研究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的影响。具体的模型如下:

$$Govern_i = \beta_0 + \beta_1 Party_i + \beta_3 Control_i \quad (1)$$

其中, i 表示单个流动人口。借鉴以往研究个人社会治理参与的文献^[18, 39, 54], 本文还控制了以下变量: 1)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相应的受教育年限加1取对数; 2) 流动人口的性别, 男性取值为1, 女性取值为0; 3) 流动人口的年龄, 调查当年的流动人口的年龄取对数; 4) 流动人口的民族, 汉族取值为1, 少数民族取值为0; 5) 流动人口的农业户口状态, 农业户口取值为1, 其他取值为0; 6) 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 未婚取值为1, 其他为0; 7) 流动人口的流动性, 本次流动开始年距离调研年的年份加1取对数; 8) 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 工资收入取对数; 9) 流动

人口的工作时间, 周工作小时取对数; 10) 流动人口落户意愿, 愿意在流动地落户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①; 11) 流动人口受到的歧视状况, 流动人口认为受到本地人歧视取值为1, 其他取值为0。本文感兴趣的系数为 β_1 。当研究假设成立时, β_1 的回归结果应显著为正数。

四、实证检验

(一)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如表1所示, 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参与的均值为0.5010, 表明样本内近一半流动人口对上述四项社会治理活动所包含的类别都没有参与, 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参与的整体水平较低。流动人口党员身份的均值为0.0414, 表明流动人口中为党员仅占总样本的4.14%, 党员比例很小。同时, 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均值为0.3885, 表明仅38.85%的流动人口愿意落户当地, 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较低。此外, 流动人口的农业户口的均值为0.8702, 表明87.02%的流动人口为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社会治理参与	8890	0.5010	0.5000	0.0000	1.0000	1.0000
流动人口党员身份	8890	0.0414	0.199	0.0000	0.0000	1.0000
受教育水平	8890	2.4990	0.2106	2.3026	2.5649	2.8332
性别	8890	0.5408	0.4984	0.0000	1.0000	1.0000
年龄	8890	3.4636	0.2717	2.8904	3.4657	4.007
民族	8890	0.9268	0.2605	0.0000	1.0000	1.0000
农业户口状态	8890	0.8702	0.3361	0.0000	1.0000	1.0000
婚姻状况	8890	0.2760	0.4471	0.0000	0.0000	1.0000
流动性	8890	1.4970	0.8835	0.0000	1.6094	3.2581
收入水平	8890	8.2967	0.5275	6.9078	8.2940	9.9035

①对于这一问题, 本文将没有回答的人定义为受到了本地人的歧视。

(续表)

工作时间	8890	3.9707	0.3274	2.3979	3.9318	4.5951
落户意愿	8890	0.3885	0.4874	0.0000	0.0000	1.0000
受到歧视的状况	8890	0.5012	0.5000	0.0000	1.0000	1.0000

(二) 基础回归

在表2的模型(1),我们并没有控制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只将党员身份与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参与进行了回归,流动人口党员身份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且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表明党员身份提高了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参与水平。在表2的第2列,我们进一步控制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性别、年龄、民族等个体特征,党员身份依然显著地提高了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参与意愿。表2的第3列,我们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流动人口党员身份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党员身份促进了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参与。

就控制变量而言,我们发现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可以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参与,这与崔占峰等的研究发现一致^[48]。其次,我们可以发现年龄的增加降低了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参与水平。这与我国的现实情况较为吻合,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流动人口难以享受当地的社保服务,年龄较大的流动人口会返乡生活,留在流动地的流动人口以年轻人为主^[51]。因此,预期到自己终将返回老家无法享受到流动地社会治理提升带来的收益使得年纪更大的流动人口有较低的社会治理参与激励。此外,在第3列的回归中,可以发现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对其参与社会治理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2 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参与的影响

	(1)	(2)	(3)
	社会治理参与	社会治理参与	社会治理参与
流动人口党员身份	0.4204*** (0.0687)	0.2626*** (0.0700)	0.2235*** (0.0710)
受教育水平		0.6054*** (0.0665)	0.4923*** (0.0675)
性别		0.1297*** (0.0274)	0.0876*** (0.0286)
年龄		-0.3137*** (0.0691)	-0.2434*** (0.0697)
民族		0.2016*** (0.0519)	0.1735*** (0.0520)
农业户口状态		-0.2118*** (0.0414)	-0.1243*** (0.0425)
婚姻状况		-0.0885** (0.0397)	-0.0215 (0.0407)
流动性		0.1457*** (0.0176)	0.1295*** (0.0177)

(续表)

收入水平			0.1818*** (0.0279)
工作时间			-0.2357*** (0.0425)
落户意愿			0.1871*** (0.0283)
受到歧视的状况			-0.1235*** (0.0277)
常数项	-0.0144 (0.0136)	-0.7002** (0.2951)	-1.2635*** (0.4161)
样本量	8890	8890	8890

注释：表中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面各表相同。

(三) 稳健性检验

我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首先，党员和非党员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得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参与的影响可能是由这些个体特征差异造成的。参考祝仲坤的研究^[51]，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于党员和非党员的流动人口进行匹配，筛选出个体特征最为接近的样本，然后采用模型(1)研究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参与的影响。在匹配过程中，我们使用Logit模型，采用一对一的近邻匹配，所采用的个体特征变量与模型(1)的控制变量相同。样本在匹配前，党员和非党员的个体特征整体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在匹配后，党员与非党员流动人口特征不存在显著差异，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平衡性检验得到满足。^①同时，如表3的第1列所示，在使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流动人口党员身份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党员身份促进了流动人口社会治理活动的参与。

在表3的第2列，借鉴杨巧和杨扬长^[56]的研究方法，我们采用Logit模型研究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参与的影响。Logit模型和Probit

模型是被解释变量为二值选择变量时最常采用的计量模型，二者的区别在于对累积分布函数假设的区别。Logit模型假设累积分布函数为逻辑函数，而Probit假设累积分布函数为标准正态函数。目前关于这两种模型在二值选择变量研究中的选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如表3的第2列所示，流动人口党员身份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二值选择变量模型的选用并没有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最后，考虑到流动人口流动地社区关怀可能会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参与，我们在表3的第3列进一步控制了当地社区关怀的影响。较好的当地社区关怀使得流动人口有更强的归属感，获得一定的经济或情感收益，可能会促进流动人口更多地参与社会治理。我们采用流动人口流动地是否为流动人口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来量化流动人口所在社区的关怀。当地为流动人口建立健康档案时，社区关怀的取值1，否则取值为0。如回归所示，在控制流动人口所在社区关怀的影响后，流动人口党员身份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值，表明党员身份促进了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参与。

^①由于版面有限，对匹配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索取。

表3 稳健性检验

	(1) 社会治理参与	(2) 社会治理参与	(3) 社会治理参与
流动人口党员身份	0.2676*** (0.0996)	0.3643*** (0.1164)	0.2237*** (0.0711)
受教育水平	1.2438*** (0.2709)	0.7911*** (0.1089)	0.4716*** (0.0677)
性别	0.2169** (0.1083)	0.1403*** (0.0461)	0.0924*** (0.0286)
年龄	-0.5093* (0.2810)	-0.3946*** (0.1124)	-0.2205*** (0.0699)
民族	-0.181 (0.2160)	0.2773*** (0.0840)	0.1702*** (0.0521)
农业户口状态	0.0579 (0.1188)	-0.2008*** (0.0688)	-0.1240*** (0.0426)
婚姻状况	-0.107 (0.1526)	-0.0347 (0.0655)	0.00270 (0.0409)
流动性	0.2029*** (0.0670)	0.2082*** (0.0286)	0.1060*** (0.0180)
收入水平	0.116 (0.0956)	0.2951*** (0.0455)	0.1807*** (0.0279)
工作时间	-0.231 (0.1468)	-0.3789*** (0.0689)	-0.2245*** (0.0426)
落户意愿	0.111 (0.1038)	0.3021*** (0.0456)	0.1827*** (0.0284)
受到歧视的状况	-0.0406 (0.1024)	-0.1995*** (0.0447)	-0.1234*** (0.0278)
社区关怀			0.2534*** (0.0302)
常数项	-1.797 (1.6129)	-2.0402*** (0.6723)	-1.3722*** (0.4171)
样本量	685	8890	8890

(四) 社会治理参与方式

在该部分, 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不同社会治理参与方式的影响。具体来讲, 我们研究了: 1) 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建议或监督单位/社区/村务管理的影响。当流动人口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建议或监督单位/社区/村务管理时, 村社单位事务管理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 2) 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

情况/提出政策建议的影响。当流动人口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政策建议时, 行政管理参与的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 3) 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在网上就国家事务、社会事件等发表言论及参与讨论的影响。当流动人口在网上就国家事务、社会事件等发表言论及参与讨论时, 网络时事的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 4) 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主动参与捐款、无偿献血、志愿者活动的影响。当流动人口主动捐

款、无偿献血、志愿者活动时,慈善志愿者活动的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如表4所示,流动人口党员身份的回归系数在第1、2和4列为正数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党员身份促进了流动人口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建议或监督单位/社区/村务管理、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政策建议及主动参与捐款、无偿献血和志愿

者活动。然而,在第3列,流动人口党员身份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数,但是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表明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在网上就国家事务、社会事件等发表言论及参与讨论并没有显著影响。鉴于网络言论的匿名性和随意性及党员受过严格的纪律培训的现实,具有党员身份的流动人口倾向于通过较为正规透明的机制参与社会治理。

表4 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参与方式的影响

	(1) 村社单位事务管理	(2) 行政管理参与	(3) 网络时事讨论	(4) 慈善志愿者活动
流动人口党员身份	0.2573*** (0.0798)	0.3618*** (0.0877)	0.0843 (0.0844)	0.2693*** (0.0701)
受教育水平	0.3401*** (0.0901)	0.2002* (0.1094)	0.4477*** (0.0900)	0.4200*** (0.0674)
性别	0.1363*** (0.0394)	0.0975** (0.0467)	0.2075*** (0.0390)	0.0569** (0.0287)
年龄	0.2208** (0.0941)	0.0736 (0.1115)	-0.4751*** (0.0984)	-0.2164*** (0.0696)
民族	0.0470 (0.0743)	0.121 (0.0938)	0.1928** (0.0783)	0.1411*** (0.0523)
农业户口状态	-0.1174** (0.0534)	-0.1254** (0.0608)	-0.0316 (0.0558)	-0.1013** (0.0422)
婚姻状况	0.0467 (0.0561)	-0.1153* (0.0685)	0.0281 (0.0546)	-0.0578 (0.0408)
流动性	0.0646*** (0.0241)	0.0326 (0.0287)	-0.0458* (0.0245)	0.1353*** (0.0178)
收入水平	0.0571 (0.0362)	0.0680 (0.0426)	0.1477*** (0.0365)	0.1853*** (0.0279)
工作时间	-0.2185*** (0.0525)	-0.3727*** (0.0567)	-0.2627*** (0.0535)	-0.2600*** (0.0423)
落户意愿	0.0933** (0.0384)	0.1352*** (0.0450)	0.0441 (0.0385)	0.1931*** (0.0283)
受到歧视的状况	-0.0312 (0.0377)	-0.0531 (0.0447)	-0.0905** (0.0376)	-0.1061*** (0.0278)
常数项	-2.7008*** (0.5238)	-1.5786** (0.6170)	-1.1374** (0.5405)	-1.2313*** (0.4149)
样本量	8890	8890	8890	8890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提高社会治理各主体的参与水平,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我国未来社会

治理发展的大方向。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及边缘化特征,使得他们在参与社会治理时较为消极。本文从个人身份的角度,研究了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党

员身份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参与水平。该结论在采用PSM方式匹配个体特征、更换实证模型及控制流动地社区关怀的影响后,依然成立。进一步,本文研究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参与方式的影响,发现党员身份促进了流动人口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建议或监督单位/社区/村务管理、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政策建议及主动参与捐款、无偿献血和志愿者活动,但是党员身份并没有促进流动人口在网上就国家事务、社会事件等发表言论及参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党员身份在提高流动人口社会治理参与方面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为此应该增强对流动人口党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加大对流动人口党组织的资源投入,发挥流动人口党员带动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同时,政府应该降低户籍对于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的阻碍作用,改善流动人口在流动地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边缘化的尴尬状况,切实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此外,流动人口所在的社区也要积极地对流动人口社会治理的参与进行帮扶,提高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

参考文献:

- [1]Meng X.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reforms in China[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2, 26(4): 75-102.
- [2]Cai F, Du Y & Wang M. Migration and labor in China[Z/OL]. <https://mpira.ub.uni-muenchen.de/19187>.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 [3]Jia P, Du Y & Wang M Y. Rural labor migr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7, 25(6): 45-64.
- [4]Brau A D, Giles J T. Migrant labor markets and the welfare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Evidence from China[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18, 32(1): 1-18.
- [5]Meng Z, Zhang J S.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 29(3): 485-504.

- [6]陈钊, 陆铭. 从分割到融合: 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J]. *经济研究*, 2008(1): 21-32.
- [7]章元, 高汉. 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户籍与地域歧视——以上海市为例[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5): 67-74.
- [8]于潇, 孙悦. 城镇与农村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J]. *人口研究*, 2017(1): 84-97.
- [9]李尧. 教育公共服务、户籍歧视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J]. *财政研究*, 2020(6): 92-104.
- [10]杨菊华.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2): 61-79.
- [11]范如国. 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4): 98-120.
- [12]王浦劬.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 (3): 11-17.
- [13]孔繁斌. 服务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知识扩散[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4(2): 31-38.
- [14]张乾友. 论政府在社会治理行动中的三项基本原则[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6): 55-59.
- [15]金太军, 鹿斌. 社会治理新常态下的地方政府角色转型[J]. *中国行政管理*, 2016(10): 11-15.
- [16]傅利平, 涂俊. 城市居民社会治理满意度与参与度评价[J]. *城市问题*, 2014(5): 85-91.
- [17]陈奇星. 城市居民公共参与的中间考察: 以上海X区社会治理实践为例[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4(6): 17-35.
- [18]张翠娥, 李跃梅, 李欢. 资本禀赋与农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基于5省1599户农户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6(1): 27-37.
- [19]李晓宁, 李雪峥, 崔健. 西部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及社会治理分析——基于陕西省岐山县G村的社会调查[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 107-114.
- [20]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处课题组, 李哲. 外来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对策研究[J]. *广东经济*, 2020(8): 6-13.
- [21]Wu F, Logan J. Do rural migrants “float” in urban China? Neighbouring and neighbourhood sentiment in Beijing[J]. *Urban Studies*, 2016, 53(14): 2973-2990.
- [22]Chow C C J, Lou C W M. Community-based approaches to social exclusion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J].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5, 8(1): 33-46.
- [23]Akerlof G A, Kranton R E. Economics and identity[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3): 715-753.

- [24]朱沅,叶文平,刘嘉琦.从军经历与企业家个人慈善捐赠——烙印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20(6):179-189.
- [25]周怀康,姜军辉,葛淳棉,等.创业归来再出发:创业烙印如何影响工作绩效?[J].管理世界,2021(7):145-161.
- [26]王群勇,李仲武.党员身份,自我认同与女性家庭地位[J].中国经济问题,2020(3):105-120.
- [27]戴亦一,余威,宁博,等.民营企业董事长的党员身份与公司财务违规[J].会计研究,2017(6):5-81.
- [28]连燕玲,张明发,周琼,等.保持先锋模范性:党员CEO思想烙印与企业慈善捐赠[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10):3-20.
- [29]李爽,陆铭,佐藤宏.权势的价值:党员身份与社会网络的回报在不同所有制企业是否不同?[J].世界经济文汇,2008(6):23-39.
- [30]叶晓阳.“以权择校”父母政治资本与子女择校[J].世界经济文汇,2012(4):52-73.
- [31]鲁元平,王军鹏,王品超.身份的幸福效应——基于党员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动态,2016(9):29-40.
- [32]Li H, Liu P W, Wai L P, Zhang J, Ma N. Economic returns to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ese twins[J]. Economic Journal, 2007, 117(10):1504-1520.
- [33]Mclaughlin J S. Does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pay? Estimating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party membership in the labor market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7, 45(4): 963-983.
- [34]余典范,王佳希.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党员高管的创新“稳定器”效应[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11):35-56.
- [35]Yan Y, Xu, X. Does entrepreneur invest mor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en joi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22, 58(3): 754-775.
- [36]杨继东,章逸然.政治:身份与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的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16(4):54-79.
- [37]付振奇,陈淑云.政治身份影响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及行为吗?——基于28省份3305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7(5):130-144.
- [38]黄灿.政治关联能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吗?——基于全国民营企业抽样数据的再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3(12):102-109.
- [39]王煥,魏娜,陈俊杰.志愿服务中的国家动员——基于CGSS2012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公共管理评论,2021(4):34-55.
- [40]张成岗,李佩.科技支撑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中的公众参与:从松弛主义到行动主义[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5):69-75.
- [41]吴建平.社会治理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5年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3):77-81.
- [42]卢艳齐.从“善制”迈向“善治”:中国社会治理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转化进路[J].广西社会科学,2021(3):82-88.
- [43]蒋天贵,王浩斌.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社会治理价值导向研究[J].求实,2021(4):4-17.
- [44]张来明,刘理晖.新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J].管理世界,2022(1):20-35.
- [45]赵小平.社会治理视阈下社会组织四类行为的特征、转化和政策建议[J].中国行政管理,2021(2):53-58.
- [46]何轩,马骏.被动还是主动的社会行动者?——中国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性研究[J].管理世界,2018(2):34-48.
- [47]张翠娥,李跃梅.主体认知、情境约束与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基于山东等5省调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5(2):69-80.
- [48]崔占峰,崔宏瑜,王泽光.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参与:青年参与的动力系统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22(1):34-41.
- [49]Marquis C, Tilsik, A. Imprinting: Toward a multilevel theory[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3, 7(1): 195-245.
- [50]杨菊华,张娇娇.人力资本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J].人口研究,2016(4):3-20.
- [51]祝仲坤.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的“挤出效应”研究——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J].中国农村观察,2020(5):110-132.
- [52]陈佳川,魏杨,许婉婷.幸福度感知、生活水平位置感知与流动人口的留城定居意愿[J].社会科学,2019(11):88-99.
- [53]冷晨昕,祝仲坤.中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现状及因素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20(6):36-42.
- [54]Palmer N A, Perkins D D, Xu Q.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11, 39(1): 89-105.
- [55]Chen G, Hamori S. Solution to the dilemma of the migrant labor shortage and the rural labor surplus in China[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09, 17(4): 53-71.
- [56]杨巧,杨扬长.租房还是买房——什么影响了流动人口住房选择?[J].人口与经济,2018(6):101-111.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of Migrant an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WU Ying & ZHANG Yi

Abstract: Migrant is a marginalized group at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levels in migrant areas. There is little discussion on the motivation and incentive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education of the Party requires Party members to play a pioneering role in production, work, study, and social life, be dedicated to public affairs, make more contributions,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serve the people, and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masses.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conducive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task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Using the data of volume a of the 2017 dynamic survey of migra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by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based on the imprinting theory and the Probit mode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Party membership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migrants in soci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identity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mproves the level of social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of migrants.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research on the ways migrants participate in social governance shows that the statu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promotes migrant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supervision for their work units and communities, promotes migrants to report on social issues and make policy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and stimulates migrants to participate in charity and voluntary activities. However, the status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fails to impact migrants' comments on national and social events on the internet.

Keywords: memb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igrant; social governance; imprinting theory; Guangdong Province

(上接第12页)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centraliz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needs of the times is a fundamental prerequisite; The development of a specific system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is a priority;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democratic centralism is a fundamental guarantee; Completing the system of publicity,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on democratic centralism is key; The great advantage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in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governance is a central demand.

Keywords: Xi Jinping;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democratic centralism; institutional strength; national governance; Party building; inner-party democracy